

中国史学史

第一册

杜维运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史学史

第一册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全三册)/杜维运著,一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0

ISBN 978-7-100-05646-5

I. 中… II. 杜… III. 史学史—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3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史学史

(全三册)

杜维运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646-5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1½

定价:72.00 元

中国史学史

第一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引论	9
第二章 史学的起源与史官的设立	32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与史学	32
第二节 东方的史学摇篮	33
第三节 史官的设立	39
第三章 史学原理的出现	50
第一节 纪实	50
第二节 阙疑	55
第三节 求真	57
第四节 怀疑	60
第四章 几部较早的史书与史学的放出异彩	67
第一节 《尚书》	67
第二节 《春秋》	72
第三节 《左传》	82
(一)《左传》的作者问题	83
(二)《左传》叙事的翔实、生动与柔美	83
(三)《左传》的内容	93

II 中国史学史

第四节 其他	96
(一)《公羊传》、《谷梁传》	96
(二)《国语》	97
(三)《战国策》	98
(四)《世本》	99
(五)《竹书纪年》	100
(六)《山海经》	101
(七)《穆天子传》	102
第五节 结语	102
第五章 史学成熟时期的来临	115
第一节 春秋以后史学气氛的弥漫	115
(一)先秦诸子据历史建立其学说	115
1. 孟子	115
2. 荀子	117
3. 庄子	117
4. 墨子	119
5. 韩非子	120
(二)一般士大夫据历史发挥其言论	122
第二节 《史记》的问世	127
(一)《史记》的史学地位	127
(二)司马迁的遭逢与《史记》的撰述	129
第三节 司马迁的史学世界	140
(一)真实的世界	140
(二)辽阔的世界	147
(三)美善的世界	149
(四)奥深的世界	159
第四节 史学的成熟时期	177

第六章 经学极盛下的史学发展·····	189
第一节 汉武帝以后经学的极盛·····	189
第二节 西汉后期的史学与经学·····	195
第三节 东汉初期史学再放新异彩·····	202
(一) 班固与《汉书》的写成·····	203
(二) 班固的史学·····	205
1. 开创了断代史·····	206
2. 叙事详赡,措辞温雅·····	207
3. 博洽而有史裁史识·····	216
(三) 班固的儒家史学思想·····	227
第四节 东汉的修史事业与儒家史学思想的 日趋浓厚·····	230
(一)《东观汉记》的修纂·····	230
(二) 经学极盛下的反动思潮——王充的《论衡》·····	233
(三) 荀悦极为浓厚的儒家史学思想·····	239
第七章 中国古代史学的世界地位·····	253
参考书目·····	272

前 言

(一)

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二〇〇四年的六月,第三册问世,前后历时十七年。旷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写史年岁,难以精确计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写一部书,心无旁骛,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撰写前所做的酝酿工作,也甚为耗费时间。我在大学时代,即做了史学史上的纠谬工作。所写〈廿二史劄记考证〉一文,费时将近两年。接着撰写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戴名世、钱谦益等史学家的史学,耗时在十年以上;负笈英伦,扩展史学视野到西方世界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又数历寒暑。如此算起来,应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当我写完此书的第二册以后,兴起而写中国通史者三年,那么撰写十七年,又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了。写史年岁,确定非易。论定《史记》历二十余年写成,《新唐书》历十七年写成,《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写成,只是概论,其中多少有其弹性。

一部中国史学史,所历的时间悠久,所涉及的空间辽阔。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所主张的写一二十万言的中国史学史,已无

2 中国史学史

法将中国史学的博大,和盘托出。此书无意铺张,而字数已近八十万言。第一册二十三万言,自先秦写至东汉,第二册二十二万言,自魏晋写至唐末。第三册三十三万言,自宋初写至清中叶。资料的搜集,第一册与第二册大致是相同的。凡先秦至唐末的载籍,尽量遍阅之,遇有与史学相同的资料,则札记别纸。到写第三册时,情况便不同了。浩瀚的载籍,已无法遍阅,只能以己意选择阅读。而且有关史学的资料,大半在专书与集部书之中,与唐以前多在正史之中者迥异。治史方法,变化多端,须灵活运用,自此可知其中的消息了。

以浩瀚广阔的眼光,用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的观点,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较,而置中国史学于世界史学之林,是我的奢望。但是所遭遇的困难重重。希腊、罗马的史学,与中国先秦、两汉的史学,大致可以互作比较,西方中世纪是史学的黑暗时期,文艺复兴以后,迄于十八世纪末叶,西方史学仍处低靡状态,中国则自魏晋迄于清乾嘉时代,史学蓬勃发展,趋于鼎盛,两者相去霄壤,难作针锋相对的比较;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史学极盛,中国史学则趋式微,形势逆转如此,比较遂难施其功能。所以书中自魏晋以后所作的中西史学比较,皆冲破了时间的羁绊,仅从史学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异同比较。中西史学的比较,有待自整体大规模进行。仅自时间发展的过程中,互作比较,难以见其全貌。中西史学的原野,像是千古荆棘之林。纵横驰骋于其中,惟待披荆斩棘的勇士。

(二)

此书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是值得是缕述的。一九九六年当此书第一册出版三年以后,任教于美国大学的黄培教授,在《清华学报》(新二十六卷第二期,一九九六年六月,台湾发行)写了一篇书评,于称美之外,提出最珍贵的意见。黄教授是老朋友,赴美讲学数十年,于国史以外,精通西洋文化史。他说为文化在成长和发展中,每受不同程度的外来因素的激荡,这是真知灼见之论,修正了拙著文化自创之说。论及春秋之“讳”,其卓见尤发我深省。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虽有其维持人类文明的深意,然站在历史必须纪实的原则上,则值非议。历史而不能如“明镜之照物,妍媸必露”,似“虚空之传响,清浊必阐”,其价值将它在?

从一九九六年以后,到二〇〇四年此书的第三册问世,在台湾未再见有评论的文字出现于学刊之中(朋友来信论及者则颇多)。在中国大陆,则反应极为热烈,出乎意料之外。

早在一九八八年,内地中华书局影印了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拙著《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这是到二〇〇五年止我的书惟一在内地印行的一本。其他如《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史学方法论》、《中西古代史学比较》、《赵翼传》等书,仅为著名图书馆所收藏,非一般学子的普遍读物。一九九六年南开大学杨翼骧、乔治忠、姜胜利三教授所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对拙著《清代史学与史家》、《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与《赵翼传》皆予好评。同年罗仲辉教授在《中国

4 中国史学史

史研究动态》(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上所发表的〈杜维运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我在中西史学比较上的研究。二〇〇一年李勇教授在《中非学刊》(二〇〇一年第三期)上所发表的〈杜维运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则提出了针砭之言。“杜维运只提到中国史学家有实录直笔的传统,殊不知也有曲笔隐晦的风气。”这是深知中国史学之论。而早在一九八八年范达人教授所发表的〈比较史学新兴,促其放异彩——杜维运教授比较史学观介绍〉(《史学理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洋洋洒洒两万言,尽是称许鼓励之辞,使我陶醉之余,又不胜战兢忧悚之情了!

二〇〇三年八月赴北京参加为期一周的“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第一次见面的于沛教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绝对想象不到你在大陆的影响!”我听到后,惊奇怀疑,而不敢陶醉!一直到二〇〇五年九月及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再去北京、上海,才大致了解了情况。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芝联先生,是我认识将近三十年的朋友,他约我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学一月,并安排赴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演讲,盛情难却,于是欣然就道,与三校师生,并作座谈三次、演讲三次。三校学生,程度优越,又极认真,所提问题,皆不空泛,尤多就我的旧著发问。如华东师大的一位同学曾写发问条云:“中西史学的比较,你只讲它们各自的优势,而不提缺点。请问,你在研究中是否崇尚唯美史学?”这是一针见血之言!长久以来,我恪遵中国“隐恶扬善”的传统,而忽略了史学上“善善恶必书”的规律。矫枉过正,宜思补救。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镇,在那里我有回家

的感觉。张越教授与方宏小姐并对我作了两小时以上的访谈,〈访谈录〉登在《史学史研究》(二〇〇五年第四期)上,长达万余言。张越教授又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二〇〇四—二〇〇五卷)上刊载了一篇〈论史学史研究中的中国史学通史撰述——兼评杜维运教授《中国史学史》〉,对我的三册中国史学史作了最详尽最中肯的评论。“作者在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再以纵向眼光比较中西史学这两大不同史学发展系统的各自特征,二者结合,使中西史学间的比较呈现出立体感”,这是肯定了拙著的特色。“认为大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未能与刘知几、欧阳修等同样列入一级标题,显然不妥”,则是有待将来调整的。“港台教书数十年,所著《史学方法论》为学生嗜读者近三十年,所著《中国史学史》,由于中西史学的比较穿插于其中,而为内地学人所激赏”,这真是写书的幸运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欣然前往参加。与会者数十人,皆中外研究史学史的专家。当代享盛誉的西洋史学史大家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名家怀特(Hayder White)皆与会,二人史学见解殊异,会场之中,争论迭起,令人感觉西方争论数十年的史学问题(西方正统史学家与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近三十年来争论不止),瞬息间在中国掀起波浪。史学的全球化,应非遥不可期;冶中外史学于一炉,不久将可能新写世界史学的一页。

我向大会提出〈中西史学的分歧〉一文,会后又为华东师大与上海大学的学生讲〈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历史研究的艺术〉两专题,年轻学子,兴趣不减,就我旧著《史学方法论》、《中国

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提问题者尤多。僻处一隅著书，而为广大的中国学子所阅读，作者兴奋之情，已非笔墨所能胜述。

(三)

旅法学人左景榕先生对我的督促与鼓励，是必须一提的。他攻治西洋史学史，尤精于希腊史学。当一九七五年他读到拙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九六六年初版本）时，曾来信云：“阁下英年时即已议论听正，既非如《新青年》时代作者之浮器，亦不同买办学者之诬罔”（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来信）。这是对我的鼓励。自此以后，鱼雁往返十余年。其来信的内容，皆涉史学，不及其他，而且一丝不苟，直言缺失（部分已见于新写本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自序中），决不敷衍。督促我写一部中国史学史几乎变成了他的责任。他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此书问世。我写《赵翼传》与编辑《听涛案》，他都认为是跑野马，浪费时间，其殷望之情如此。可惜此书全部出版后，他已年届高龄，卧病巴黎，恐怕已无法详细阅读了。

一九八五年前后，我与景榕先生在香港见过一面，他开头就对我说：“酒、色、财、气四字，我只腾了一个字。”我想，他有胃病，不可能嗜酒；当时他已不年轻，好色也难；莫非好货？他随即说：“我‘气’不平！”他气洋人傲慢，“无可救药”（来信中语）。旅法数十年，时时听到鄙视中国之论，又怎能不气愤填膺呢？

维运能望史学的门墙，台湾大学历史系老师的培育之恩，永远不能忘。沈刚伯、刘崇鋮、姚从吾、李宗侗、夏德仪、牟润孙、

张致远、劳幹、方豪、余又荪、杨绍震等都是学博识精的史学家，他们循循善诱，课堂上、走廊里、研究室中，授业解惑，从无倦容。有时我们到老师家去坐，青田街、温州街的教授宿舍，木屋竹篱，推门可进，当时老师的门是永远为学生开着的，不用先约，兴至即去。健谈如沈刚伯、李宗侗、夏德仪、牟润孙诸师，可能与你倾谈至深夜。此情此景，如诗如画，而史学的传授，即在其中。同门中人才济济，又岂偶然？

同辈朋友与从游的学生，对我的启发与激励，非笔墨所能详述。在此恕不列举冗长的名单。惟须一提的是为此书写长序的阎沁恒教授。沁恒教授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班好友，畅谈在一起，遨游在一起，饮酒在一起。他度量恢弘，与其酒量相伴。政大历史系气氛和谐，成绩美富，他的领导，居功甚伟。此书得其序而增辉，能不竭诚一谢！

执出版界牛耳的商务印书馆慨允在内地出此书，深感无限光荣。张越教授、丁波先生竭力促成之，其情感人，一并致谢。

二〇〇八年元月

于温哥华

第一章 引论

(一)

人类在芸芸万物中,被认为最神妙(注一),最具灵性。茫茫宇宙,因为人类的出现,而光彩四射,风云变幻。“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注二),哲学上的冥想,到人类智慧大开后,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人类出现于宇宙间,可能历经数万年或数十万年。宇宙初开,浑浑噩噩,原始人类为生存而作的竞争,一定万分艰辛曲折,编为史诗,必然可观。可是这一些已如云烟般消逝于天地之间了,再也无法追寻与想象了(注三)。“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或任何遭遇,没有留下痕迹,等于这些事都没有发生过”(注四)。没有留下痕迹的人类的过去,是空旷虚无的,是漆黑一片的。夜色深沉,旷野驰步,虽着鲜衣,有谁能知?

人类的过去,主要靠文字的记录留下痕迹(注五),所以人类的历史时期或所谓文明时期,是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同时用文字记录往事开始。人类的文字记录,将人类漆黑的过去照亮,像是空旷虚无的,出现了真实景象。

人类用文字记录往事的时间,长不过五千年,比起人类出现

宇宙的时间,不过片刻。可是由于文字记录的丰富,这片刻像是永恒。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像飞鸟般过去,五千年却一直停在那里,人类的风云际会,新知(new things)发明,历历如绘;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像是频频发生于眼前。文字的记录,留下了五千年;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于是也是人类的伟大时期。

人类为什么有兴趣记录往事呢?是出于为存往事而存往事的纯粹动机呢?还是另有其他目的?记录的方法,是否周详呢?记录的态度,是否客观呢?什么样的思想与观点,支配记录者?记录的内容,可靠到什么程度?这一些,又涉及所谓史学的问题了。所谓史学,西方相对的名词是 historiography,犹如历史与 history 的相对。史学是什么,难以下一令人极为满意的界说。不过,凡是从事历史工作者,大致都能有一番理解。所谓史学,从狭义方面讲,是讨论历史著述的学问;从广义方面讲,是讨论历史发展的学问。历史事件发生了,当时或稍后被记录下来,这是原始的历史记录,也就是所谓原始的史料。这些历史记录是史学家据以写成历史的基本,史学家批评其真实程度,运用独特的思想与方法,参伍错综各方面的证据,写成体大思精的历史巨著,一套历史著述的史学,于是就展现了。至于历史如何发展,其轨迹是否可寻?其意义是否可见?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历史的远景怎样呈现?讨论这类问题,就是另外一套历史发展的史学了。所以孔子写《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是历史著述方面的史学;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注六)之说,是历史发展方面的史学。史学,史学,变化多端,质言之,如是而已。

世界上出现的民族,不是都有兴趣记录往事。有些民族,永

远无意于知其过去，他们有时为视发生于过去的事件若泡沫的哲学或宗教所支配，看一切像在风中飞舞的枯叶，了无意义。有些民族像是离说神话故事的阶段不远（注七）。两个大的例外，是中国民族与西方民族。中国民族在上古时代文字发明的伊始，就已有兴趣记录往事了。西方可溯至古典的希腊，远一点可溯至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也已有了记录往事的事实。记录往事是史学出现的前驱，大约记录往事的传统延续到相当时期以后，而史学出现。人类的历史时期，长不过五千年，人类的史学时期，则长不过三千年。有些民族与地区，甚至从与史学无缘（注八）。从悠久的历史，蔚为绵延不绝的史学，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极为值得珍视的一种发展。这种值得珍视的发展，也最能从中国与西方世界看到。

中国自上古以来，史学赓续发展，两千余年，未尝一日中绝，其余力复开辟邻近国家的史学，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其史学无一不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注九）。西方世界自希腊时代起，经过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而至近代，史学发展成一门灿烂的学问，德、意、英、法、美等国的史学，都是属于此一史学系统。举世史学，最值称道讴歌者，不出此两大系统。所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应是世界史学的最大遗产（注一〇）。

（二）

世界两大系统的中西史学，是中西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产物，相去绝远，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十九世纪末叶，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势力，挟带西方史学涌入中国（注一一），